

论《在西方的目光下》中的道德危机与拉祖莫夫的伦理选择

On the Moral Crisis in *Under Western Eyes* and Razumov's Ethical Choice

杨玉立 (Yang Yuli)

内容摘要：《在西方的目光下》展现了俄罗斯特殊伦理环境中个人面临的两难伦理选择与悖论。压倒性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环境混淆了小说主人公拉祖莫夫的道德方向。偶然间，他被卷入了政治案件，面临着革命与专制两种极端的伦理选择。支持专制政府却背叛了革命者哈尔丁，拉祖莫夫由此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双重伦理身份，陷入身份危机和道德危机。为了摆脱困境，他做出了悲剧性的伦理选择——忏悔并坦白自己的背叛，重新找回道德方向。拉祖莫夫的悲剧揭示了在极端的政治伦理环境下个体永远面临悖论和两难，几乎不可能做出一劳永逸的符合多重价值需求的伦理选择。

关键词：《在西方的目光下》；约瑟夫·康拉德；道德危机；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杨玉立，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the Moral Crisis in *Under Western Eyes* and Razumov's Ethical Choice

Abstract: *Under Western Eyes* shows the dilemma and paradox faced by individuals in Russia's particular ethical environment. The overwhelming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confuse the moral direction of the novel's protagonist, Razumov. Occasionally, he was involved in a political case and faced the two extreme ethical choices of revolution and autocracy. Supporting the autocratic government but betraying the revolutionary Harding, it produced a contradictory dual ethical identity and Razumov fell into an identity crisis and a moral crisis.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he made a tragic ethical choice—repentance and confession of his betrayal, and regained his moral direction. Razumov's tragedy reveals that in the extreme political and ethical environment, individuals are always faced with paradoxes and dilemmas, and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make ethical choic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multiple values once and for all.

Keywords: *Under Western Eyes*; Joseph Conrad; moral crisis; ethical choice

Author: Yang Yuli is Ph.D.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1401036768@qq.com).

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出生于沙俄统治下的乌克兰，父母死于政治迫害，成年后的二十年里康拉德跟随法国船队游历了众多国家，最后在英国定居进行小说创作，康拉德的双重文化背景和政治经历构建了其小说的复杂性。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俄国文化对英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东方进行了新的观察和价值评判，康拉德的小说集中体现了俄罗斯这一特定空间中的政治与伦理冲突。《在西方的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 1910）是康拉德的代表作，也是作家唯一一部以俄罗斯为背景的小说，小说既包含复杂的俄罗斯政治问题，也反映了个人在极端政治伦理环境下面临的伦理两难与悖论。

英国批评家莫顿·扎贝尔在上世纪 50 年代所写的一篇导论性文章《对西方的威胁》（*The Threat to the West*）将这部作品置于旧俄罗斯时代的历史语境之下，指出康拉德写作此书的意图乃是为“西方人在需要做出道德判断时”提供一种“预言性的警告”（Knowles 384）。小说《在西方的目光下》由此进入批评家的视野。但随之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却使得当时众多的批评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这部作品的国际背景及其政治性内涵。从这一趋势可以看出该小说的道德批判和政治批评占据了西方批评的主流。国内研究也是如此，宁一中在《康拉德学术史研究》中有对国内康拉德研究的概括：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康拉德的政治态度，点出了康拉德政治保守派的立场，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道德方面也散发着英式的保守气息。另外，批评家注意到尽管康拉德尽量保持着中立立场，但小说中的俄国形象恰恰暴露出康拉德政治思想中的诸多的矛盾点，禁欲主义外表下无法掩盖的矛盾冲突，才是康拉德政治意识的内核。¹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以《在西方的目光下》为例，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结合康拉德的创作背景，从拉祖莫夫面临的两难的伦理选择、拉祖莫夫的身份与道德危机、拉祖莫夫道德方向的迷失与回归三个方面探讨康拉德如何在特定空间展现个人的道德危机。具体而言，极端的政治伦理环境使拉祖莫夫面临着极端的伦理选择，混淆了他的道德方向。拉祖莫夫的理性的伦理选择使他产生了矛盾的双重伦理身份，陷入了身份危机和道德危机，最后拉祖莫夫不得不做出悲剧性的伦理选择重新确立自己的道德方向。

1 参见 宁一中：《康拉德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年，第 298 页。其他研究主要包括 20 世纪前期的康拉德研究，认为小说《在西方的目光下》揭示了“典型的康拉德情节”，同时提出了新问题：1. 康拉德如何通过俄国形象的描绘再现他所阐释的问题？2. 同样是自我救赎为创作重点，康拉德选择俄罗斯题材，意义有何不同？

一、革命还是专制——两难的伦理选择

小说的主人公拉祖莫夫想要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但他又面对着身份困惑，这种困惑来源于他的孤儿伦理身份。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聂珍钊 263）。拉祖莫夫是一个孤儿，因此缺乏一个被他人认可、与他人联系的伦理身份，拉祖莫夫的身份建构与俄罗斯这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哈尔丁的出现，拉祖莫夫被牵扯进政治事件中，面临着极端的伦理选择：是否帮助哈尔丁不仅是个人行为抉择，更是一种政治方向选择。

从小说的开篇，拉祖莫夫就被家人的缺席所定义。拉祖莫夫处在社会关系的边缘，缺乏明确的身份感和方向感，“无论是在官方上还是在事实上，他都没有家庭〔……〕，没有家庭影响了他的感受和塑造了他的观点。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个在深海里游泳的人一样孤独。拉祖莫夫这个词仅仅是一个孤独的个体的标签”（Conrad 9）。拉祖莫夫有着不可知的过去与未来，与康拉德在《独裁与战争》中对俄罗斯的描述相呼应，拉祖莫夫与那些未定义、本质上不可知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由于没有明确的个人历史和身份，拉祖莫夫将自己的身份与俄罗斯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他声称俄罗斯是他的父母，并渴望成为一名著名的学者。拉祖莫夫专注于写一篇获奖文章，他相信：“卓越将把拉祖莫夫的标签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字”（Conrad 13-14）。拉祖莫夫希望用国家的历史来补充他自己的历史和背景。他开始努力写作，试图通过写作叙事构建自己的伦理身份。拉祖莫夫试图通过写一篇既能满足学术权威又能满足政府权威的文章，来为他漫无目的的存在创造一个基础，来讲述一个能给他提供身份和目的的故事。

拉祖莫夫的写作思考很快被打断了，哈尔丁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拉祖莫夫的房间。哈尔丁策划并实行了一场政府官员的刺杀活动，正在躲避政府的追捕，他请求拉祖莫夫提供帮助。拉祖莫夫被推到了一个抉择的路口。选择是否帮助哈尔丁也是一种极端的政治选择——选择革命还选择独裁。对于拉祖莫夫来说，选择帮助哈尔丁意味着选择革命，意味着与政府的决裂，也意味着与自己的过去，与民族的过去的决裂。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文学作品中，伦理选择往往同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因此伦理选择需要解决伦理两难的问题”（聂珍钊 268）。拉祖莫夫面临着伦理两难的困境，专制和革命是一个两难选择，选择专制政府意味着背叛自己的朋友，而选择哈尔丁意味着背叛自己的过去、毁掉国家的传统，拉祖莫夫难以做出选择。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两难是难以做出选择的，一旦做出选择，就往往导致悲剧。拉祖莫夫的伦理两难是在政治与伦理的冲突中产生的，拉祖莫夫的伦理选择导致了他的个人悲剧。

拉祖莫夫开始思考意识形态问题，他感悟到民族苦难的历史、人民的忍耐和土地的沉默并渴望归顺于强大而同一的意志。他把哈尔丁视为分裂的代表，意识到必须与革命者划清界限。他决定反对革命，支持特权，接着，拉祖莫夫开始树立信念、寻找立场。他的思想始终没有脱离意识形态的论争，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难以回避的冲突。俄国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思想斗争汇聚在拉祖莫夫心头。拉祖莫夫的立场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他排斥自由主义，排斥自我冲突的现实，他拒绝现实的矛盾和分裂，转向宗法社会的古老信念，接受强权意志和独裁政府。

最终他理清了头绪，写了上下排列的五个句子：历史而非理论；爱国主义而非国际主义；进化而非革命；指导而非破坏；团结而非分裂（Conrad 68）。在这几组对立中拉祖莫夫选择了前者。拉祖莫夫与俄罗斯这个国家紧密相连，他无法想象个人与社会对抗的命运，因此对哈尔丁的要求和革命事业产生了抵触。对于拉祖莫夫来说，他依靠俄罗斯虚幻的历史稳定为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提供一个基础，而哈尔丁的进步只能通过暴力来实现，因此将不可避免推翻这个国家的历史。正如他向哈尔丁抗议的那样：“我没有家庭传统、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我的传统是历史性的，除了你们这些先生们想要毁掉的国家的过去，我还有什么可回顾的？”（Conrad 61）

拉祖莫夫最终做出了背叛哈尔丁的伦理选择，他将哈尔丁的行踪报告给了政府。作为理性意志的代表，拉祖莫夫选择了对历史的修正而不是对历史的颠覆。拉祖莫夫希望回到过去有序而非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他认为这个国家也是如此。因此，他相信国家的出路是保守主义所坚持的修正，俄罗斯需要新的方向和理论指导，这些都基于民族的统一。可是拉祖莫夫做出的伦理选择直接导致了哈尔丁的死亡，并且导致他的伦理身份的瓦解，最终导向了他的悲剧命运。

二、负重或赎罪——拉祖莫夫的身份与道德危机

拉祖莫夫因告密行为与俄罗斯当局产生了联系。当拉祖莫夫去拜访 K 亲王时，K 亲王像慈父一样安慰他：“没有人怀疑你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在这方面你放心”（Conrad 82）。K 亲王并不怀疑拉祖莫夫，作为独裁政权的领袖，他维护了本党的利益，没有就暗杀事件询问拉祖莫夫。但 T 将军对拉祖莫夫产生了怀疑，他不断地询问拉祖莫夫，对他表现出极大地兴趣，拉祖莫夫感觉到 T 将军的怀疑，他可能终其一生都是政治嫌疑人。哈尔丁被捕后，特工搜查了拉祖莫夫的房间，所有文件都被翻阅了，显然，以 T 将军为代表的权威不会轻易放过拉祖莫夫。对 T 将军而言，拉祖莫夫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可能对政府构成潜在的威胁，他把拉祖莫夫视为嫌疑人。

拉祖莫夫被不安和恐惧包围，不断地为自己辩解。拉祖莫夫的辩白给米库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米库林看来，拉祖莫夫那种“独特的气质、多变

的思想以及动摇的良知”无疑使他成为了被派往欧洲以打探流亡者情报的最理想人选米库林在这个“不寻常的”、“已经被控制住”的年轻人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Conrad 255）。他以一种不容拒绝的强硬语气对拉祖莫夫说道：“你往哪儿去啊！你走的时候像空气一样自由，但是你最终得回到我们这儿，你已经变成了上帝的工具”（Conrad 246）。拉祖莫夫被专制政府构建了另一种伦理身份：统治者的工具。最终拉祖莫夫沦为政治工具作为间谍被派往日内瓦监视那里的革命分子。

拉祖莫夫的身份很快引起了革命者的怀疑，他们怀疑拉祖莫夫与哈尔丁事件之间的关联，认为是拉祖莫夫背叛了哈尔丁。在哈尔丁进行暗杀活动之前，他寄给远方的家人和革命伙伴一封信，信中提到了拉祖莫夫，哈尔丁将拉祖莫夫描述为“没有污点、崇高而孤独的存在”（Conrad 170）。对于想知道哈尔丁最后几天发生了什么事的人来说，信中出现的拉祖莫夫是唯一的线索。拉祖莫夫不想再提及这件事，同时又试图隐瞒自己的背叛，导致革命者对他误解不断。红鼻子学生给革命者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齐米尼奇可能与哈尔丁被捕有关。当索菲亚·安东诺夫娜谈到齐米尼奇时，拉祖莫夫立刻否认认识他。安东诺夫娜得出结论：齐米尼奇背叛了哈尔丁，为此他怀着悔恨自杀了。齐米尼奇将拉祖莫夫从困境中暂时拯救出来，成为了哈尔丁事件的替罪羊。

哈尔丁最后的信件和拉祖莫夫的刻意隐瞒导致了革命者对拉祖莫夫身份的误解，将他视作被证实的革命者、朋友和同志，他们单方面建构了拉祖莫夫的身份。对于革命者来说，哈尔丁暗杀 P 大臣是一件伟大的事，而拉祖莫夫帮助哈尔丁完成了这项事业，他们对拉祖莫夫表示尊敬。可拉祖莫夫并不认同革命者的政治选择，而且革命者哈尔丁的出现彻底毁掉了拉祖莫夫的生活，拉祖莫夫对革命者充满了厌恶，当伊万诺维奇夸赞拉祖莫夫是一个非凡的人时，他反驳说伊万诺维奇错了，甚至幻想“他不仅可以毫无愧疚的刺伤他，而且还可以带着一种可怕的、胜利的满足感刺伤他”（Conrad 199）。拉祖莫夫对革命者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对哈尔丁及其家人的愧疚，另一方面是对革命者的憎恨。

拉祖莫夫背叛哈尔丁的伦理选择使他彻底失去了自由，被构建了双重伦理身份：既是专制政府的间谍又是帮助哈尔丁的革命者。这两种伦理身份相互矛盾，给拉祖莫夫带来了身份危机和道德危机。对于拉祖莫夫来说，这两种伦理身份都是他所不认同的：首先，专制政府对哈尔丁的处决和对拉祖莫夫的利用使拉祖莫夫看到了政治的黑暗，他既对哈尔丁充满愧疚也对自己的政治选择产生了怀疑。其次，他并不认同哈尔丁和革命者的革命理想，拉祖莫夫认为暴力革命将使俄罗斯陷入无序状态。拉祖莫夫在这两种伦理身份下不得不忍受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折磨，他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摆脱这两种身份。另外，作为特工，拉祖莫夫被派往日内瓦深入革命圈，拉祖莫夫并没有获得

独裁者的信任，由于政府的不信任，拉祖莫夫时常感到焦虑不安和痛苦。而革命者对拉祖莫夫的友善态度让他既愧疚又厌恶。作为双面间谍，他既要与革命者保持往来又要面对哈尔丁的家人，双重身份使他不得不编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对哈尔丁的愧疚和恨意使他备受煎熬，他的身体也因此经常处于病痛之中。

哈尔丁毁掉的不仅是拉祖莫夫唯一拥有的那种孤独而又艰苦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政治暴力使得拉祖莫夫陷入了一种极其痛苦的道德两难境地。在哈尔丁所代表的“无法无天的革命暴政”和米库林所代表的“无法无天的专制暴政”的双重挤压之下（Conrad 71），拉祖莫夫别无选择，在出卖他人的同时他也使自己成为了“暴政的奴仆”（Raval 141）。拉祖莫夫既不认同暴力革命，又憎恨专制政治的残暴。他既为流亡者所误解，又为当局所怀疑。他在任何一方都得不到真正的安宁，而任何一方又都在拉拢他。他好像是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促着，“被驱使”到日内瓦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Conrad 192）。

拉祖莫夫难以解决自身的身份危机和道德危机，他再次面临伦理两难：负重前行还是赎罪。选择继续维持双面间谍的身份意味着失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情的机会和构建新身份的可能，拉祖莫夫不得不活在无数的谎言和对哈尔丁无尽的愧疚之中；而选择坦白和赎罪必然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还会遭受革命者报复和哈尔丁家人的怨恨，极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拉祖莫夫在这种伦理困境中饱受身心的痛苦和折磨难以做出选择，他深知无论自己作何选择都难以摆脱悲剧命运。

三、罪与罚——道德方向的迷失与回归

随着告密事件的发展，拉祖莫夫的伦理身份变得复杂且相互矛盾。拉祖莫夫无法对他的伦理身份产生真正的认同，因此处于持续的身份焦虑中。在日内瓦，拉祖莫夫无法构建一个合理的、连贯的伦理身份，两种身份带来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使得拉祖莫夫渴望自由和独立、渴望道德救赎。在圣彼得堡的拉祖莫夫曾经试图通过写一篇文章来弥补他的伦理身份缺失，在日内瓦，他同样通过写作补足自己的伦理身份。拉祖莫夫早期的文章与俄罗斯的现实是不一致的，拉祖莫夫在日记中假定了一种连贯的身份感，而在日内瓦，双面间谍拉祖莫夫无法建构一个合理、连贯的伦理身份。拉祖莫夫的两种矛盾的伦理身份使他几乎被撕裂了，他无法持续扮演两种对立的角色，无法承受伴随两种身份的痛苦、内疚和焦虑。

拉祖莫夫的伦理身份是模糊的和碎片化的，是一种政治残留，拉祖莫夫强烈地感觉到他的道德人格受到专制政府和革命者这些不法势力的支配。拉祖莫夫对两种政治都缺乏忠诚，无论是支持革命推翻俄罗斯政府的运动，还是防止当局被推翻，拉祖莫夫都缺乏对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真正认同。拉祖莫

夫就像是一个“被上帝完全抛弃的人”（Conrad 250）。他的遭遇既体现了政治暴力对于个体存在的毁灭性影响，也体现了现代人的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道德方向感的丧失。他现在的处境是“一切都抛弃了他——希望、勇气、信任，他的心就像是突然间倒空了”。对于拉祖莫夫来说，“一切都消失了”，他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空白”（Conrad 268）。

在与革命者短暂的和谐相处中，拉祖莫夫得以稍稍放松。但他始终无法面对哈尔丁的母亲和妹妹，面对她们友善的态度，拉祖莫夫感到矛盾、自责和懊悔。他知道，“日复一日，如果没有一种道德抗衡的力量”，自己是“无法支撑下去的”（Conrad 194）。他醒着的时候感到孤独，而睡梦中“一种异乎寻常的道德孤独感”也像幽灵一样地死死的缠着他，（Conrad 256）苦涩的爱情与无尽的悔恨让他觉得自己的存在仿佛是一个谎言。他急需一次彻底的忏悔和坦白。这种坦白既是一次心灵的炼狱之旅，更意味着一种伦理身份的重构。惟有如此，他才能摆脱“自责”和“那谎言的牢笼”（Conrad 299），才能摆脱“往事中的傀儡身份”（Conrad 48）和那“痛苦而自我否定的生活”（Conrad 296）。在博雷尔城堡，拉祖莫夫凝视栏杆，思考着已褪色的自由的记忆，当拉祖莫夫发现除了坦白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让他获得内心的平和、自由和救赎时，他做出了向哈尔丁小姐忏悔和向革命者坦白的伦理选择。

拉祖莫夫对娜塔莉的忏悔代表着与熟悉的政治和浪漫叙事的决裂，他的忏悔切断了他与其他人所建立的所有联系。通过承认背叛了哈尔丁，他证明了自己对革命者和当局来说都是无用的和不值得信任的，并且拒绝接受一个矛盾的伦理身份。拉祖莫夫最后的供词是自杀性的，他完成了书面文书，等到午夜走进了暴风雨中。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拉祖莫夫的死亡，但忏悔并没有摧毁拉祖莫夫的身体，拉祖莫夫在革命者的报复中存活了下来。

拉祖莫夫的忏悔是一种自我清空，在最后的陈述中，拉祖莫夫强调了他的忏悔自愿性和忏悔带给他的自由：“今天，我得到了内心宁静，我使我从谎言和悔恨中解脱出来，独立于世上的每一个人”（Conrad 368）。拉祖莫夫强调他与所有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疏远，在政治和历史中独立于所有人。拉祖莫夫被革命者施暴致残，永远失去了听觉，但拉祖莫夫坚强的存活了下来，远离了政治、解构了他人构建的伦理身份。拉祖莫夫活下来了，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并依赖特克拉，娜塔莉也放弃了她早期的理想主义并原谅了拉祖莫夫。拉祖莫夫通过忏悔与赎罪展现了构建新的伦理身份的可能性。

在拉祖莫夫对革命者坦白之后，他受到了惩罚，但他并没有被周围的人抛弃。当他被双面密探尼基塔击聋双耳，继而又被电车撞倒之后，流亡者特拉克抢步上前将他扶起，并对围观的行人说道：“这个年轻人是俄国人，我是他的亲人”（Conrad 305）。特拉克救了他并将他带到俄罗斯南部照顾他、帮助他康复。革命者敬佩拉祖莫夫赎罪的勇气，把他的忏悔看作是一种勇敢

而可敬的行为，哈尔丁小姐认为拉祖莫夫是暴行的受害者，他们最后都原谅了拉祖莫夫，拉祖莫夫最终摆脱了隔阂，融入了社会。拉祖莫夫通过坦白实现了自我独立，重构了自己的伦理身份。

社会伦理环境决定社会道德方向，俄罗斯特殊的伦理环境将拉祖莫夫带入了极端的伦理困境，拉祖莫夫身上集中体现了政治环境导致的政治和道德不可调和的冲突，不论拉祖莫夫做何选择，都将导致悲剧。正如康拉德在《独裁与战争》中描述的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是压倒一切的存在。俄罗斯被视为一种堕落、一个深渊、一种毁灭元素。她不是一片空虚，她是东西方之间一道巨大的鸿沟；这是一个无底深渊，吞噬了每一个仁慈的希望，每一个对个人尊严、自由、知识的渴望，每一个内心崇高的愿望，每一个良心救赎的低语。¹俄罗斯充满了意识形态斗争，改革还是革命，学习西方还是抵制西方，俄罗斯社会环境中极端的意识形态斗争决定了个人所面临的极端的伦理选择。

拉祖莫夫的悲剧是注定的，他无法摆脱社会伦理环境带来的极端的伦理选择，拉祖莫夫迷失了道德方向，无论他做何选择，都将被带入极端的伦理困境。社会政治秩序的冲击使得拉祖莫夫无法做出准确的道德判断，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得伦理选择才能找回道德方向。正如安德烈·布萨（Andrzej Busza）所观察到的：拉祖莫夫的悲剧在于，他生活在一个给其成员带来极端困难的道德问题的社会中，同时又混淆了他们的道德方向。²拉祖莫夫的悲剧集中体现了专制政治给个体带来的道德危机，个体在其所处的极端情况下几乎没有可能做出一劳永逸的符合多重价值需求的伦理选择，他永远面临悖论和两难。

Works Cited

- Armstrong, Paul. "Conrad's Contradictory Politics: The Ontology of Society in *Nostromo*."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31 (1985): 1-21.
- .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nrad and James: *Under Western Eyes* and *The Ambassadors*." *Yearbook of Research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2 (1996): 143-162.
- Busza, Andrzej. "Rhetoric and Ideology in Conrad's *Under Western Eyes*." *Joseph Conrad: A Commemor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6. 105-118.
- 约瑟夫·康拉德：《在西方的注视下》，许志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
- [Conrad, Joseph. *Under Western Eyes*, translated by Xu Zhiqiang.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5.]
- Conrad, Joseph. *Fiction of Joseph Conrad*. Oxford: Oxford UP, 1999.
- 1 参见 Joseph Conrad, "Autocracy and War." In *Notes on Life and Lett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5: 100-101.
- 2 参见 Andrzej Busza, "Rhetoric and Ideology in Conrad's *Under Western Eyes*." *Joseph Conrad: A Commemor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6: 111-112.

- . “Autocracy and War.” *In Notes on Life and Lett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25.
- Erdinast-vulcan, Daphna. “The Conradian Subject-in-Process: The Question of Ethics in *Under Western Eyes*.” *Under Western Eyes*. Amsterdam: Brill Press, 2011. 95-105.
- . “On the Edge of the Subject: The Heterobiography of Joseph K. Conrad.” *Genre-Forms of Discourse and Culture* 28 (1995): 303-322.
- Hollander, Rachel. “Thinking Otherwise: Ethics and Politics in Joseph Conrad’s *Under Western Eyes*.”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38 (2015): 1-19.
- Knowles, Owen, Gene Moore. *Oxford Reader’s Companion to Conrad*. Oxford: Oxford UP, 2000.
-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42.
- 宁一中：《康拉德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年。
- [Ning Yizhong. *A Study on Conrad’s Academic History*.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4.]
- 龙瑜成：“《在西方目光下》中的俄罗斯”，《外国文学评论》2（2016）：131-147。
- [Long Yucheng. “Russia in the *Under Western Eye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 (2016): 131-147.]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